

引文格式: 郝桂菊. 中西文明跨文化交流范式变迁与未来选择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1 (6): 108-116.

中西文明跨文化交流范式变迁与未来选择

郝桂菊

摘要: 文明与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开展国际交往的独特的精神与价值符号。在廓清文明与文化理论内涵的基础上, 从差异与多元视角分析中西文明跨文化交流范式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融, 梳理中西方两个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与对话以及现代化的延宕, 回顾新中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辨析新时代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论证人类社会未来选择是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 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和彰显国际道义与责任担当, 践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

关键词: 文明; 文化; 中西文明; 交流范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郝桂菊,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双一流’高校科教融合的‘三全’整体性制度体系构建”(ZX202010)。

中图分类号: G125; K20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6.012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开阔胸襟, 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 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 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1] 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 在长期演进过程中, 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 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今天, 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 广泛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旧邦新命, 弘扬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历史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 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价值旨归。

一、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文明是文化内在价值的历史积淀, 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是一元的, 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 文化是多元的, 是以不同民族 (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3]。文化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成果, 包括积极的与消极的、进步的与反动的; 而文明仅指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所创造的物质成果, 是一切积极成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文化与文明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文明是某一民族或族群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创造的具有文化或宗教共同体社会

特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第一，文明是随着人类社会走出混沌和蒙昧而出现的。人类为自身的发展而创造文明。文化的出现早于文明数百万年。第二，文明的性质总是正面和积极的，是指人类改造世界的优秀成果和社会进步状态，而文化则具有两重性甚至多重性，如有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优秀与低劣、高尚与庸俗、精华与糟粕、革命与反动等的区别。第三，文明不能覆盖全部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文明，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文明形成以前的原始文化。原始文化蕴含着文明的潜在因素，孕育着人类文明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文明的萌芽。

文化偏重于内在精神和思维范式，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由于文化价值具有相对性，而各民族价值观念不同，故各民族文化不具可比性。正如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作为物质文化的文明是累积的和扩散的，而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等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是非累积和凝聚的。世界历史规律证明，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创立密切相关，通常只有历史上创立过国家形态的民族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璀璨的文明，而没有建国史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难以形成本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明。文明同野蛮相对，文化同自然相对。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特有素质，具有主观性、独特性、个体性的遗传基因，文化发展是对特殊原则的同化或依附，而文明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可传播性，可以造福于各个民族。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全球有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使用6000多种语言，交织成当今人类文明的多彩画卷。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范式

global（全球的）一词出现于1676年，globalize（全球化）1944年才使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全球民族国家社会空间的相互交织日益紧密，国与国之间在安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化模式拓展及全球意识的扩散中^[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转向：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世界的文学。

跨文化交流包括：国际交流/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文化认知（cultural perception）、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跨文化适应（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djustment）、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跨文化训练（cross-cultural training）、跨文化关系（cross-cultural relationship）、跨文化冲突（cross cultural conflict）、跨文化谈判（cross-cultural negotiation）、跨文化沟通能力（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等。德国社会政治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力作《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一书中对于全球化的特点进行了以下八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地域的扩张、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以及越来越强劲的跨国经营势头；第二，信息革命及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第三，对人权，也即民主原则（哪怕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的普遍追求；第四，源于全球文化产业的意象流（the stream of images）；第五，

后民族的世界多极政治的出现,其中跨国集团(譬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在权利和数量上与政府组织一道增长;第六,世界贫困问题;第七,全球性的环境灾难问题;第八,一个乃至多个地方出现的跨文化冲突。

范式(paradigm)是公认的模型或模式。从宏观层面,范式可以理解为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技术、价值、信仰等方面的集合。据此引申,思维范式是指立足于一种世界观、认知体系、信念等而形成的固有、稳定、可反复使用的具有范例特点的思维规范、模型或模式。

文化交流范式变迁源于国际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视角,“西方”的概念既是地理和物质层面的,又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历经罗马帝国、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启蒙运动、殖民扩张直至美国崛起,西方文明体系不断被充实和强化。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基于海洋-大陆扩张和金融霸权,在物质层面引领了近代化和现代化、军事革命和科技创新,主导了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文化层面形成与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霸权。17、18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呈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完美东方的想象;19世纪以降,随着殖民主义工业文明对东方农耕文明的蔑视,保守落后的清政府和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形象在西方一度占据主流地位。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恢复,传统及当代中国感召力增强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汉语普及水平和竞争力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相比差距仍十分巨大,应利用机遇在新旧范式转换中完成中国文化的世界使命。

文化影响交际,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相异的交际范式。著名跨文化交际学者 Brislin R. W. 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大多数操同一种语言、栖居在一起的人们所分享的世代相传的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价值和观念。跨文化交流,英文为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进行的跨文化圈的交流。交流,意味着用目的外语进行表达,而在语言表达过程中还有许多沟通上的问题。不仅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流畅,更要考虑“跨文化沟通”。国家外交、公共外交、民间交往、跨国公司、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等都属于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由于跨文化诸要素特别是民族思维、秉性、行为范式存在差异,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跨文化冲突,即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范式和要素之间出现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现象。爱德华·霍尔把文化分为高语境(high-context)和低语境(low-context),两种不同语境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流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高语境是指在对话交流中确认或猜测对方与自己有着共享的情感认同、知识和背景;低语境则与此相反,确认或假设对方与自己没有或很少有共享的背景。东方文化中的中日韩属于高语境国家,西方国家为低语境国家。但是,东西方高低语境的概念在当下中西方交流的宏大背景下已经发生变迁,东方的网状循环式思维与西方的理性分析式线性思维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内在合理性,在双向交流和文化传播中,应充分提供话语的背景信息,考虑和尊重对方的思维特点,融入和适应对方的文化。

中西文化范式差异见表1。

调节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时,最明显的差异,乃

表1 中西文化范式差异

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高语境	低语境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等级观念	平等观念
中庸传统	进步变革
寡欲勤俭	物质享受
面子人情	自由竞争
含蓄的网状思维	直率的线性思维
内敛	外向

在于无法共享符号系统 (shared symbol system), 甚至还会赋予相同的符号不同的意义。这种符号的异质性是跨文化沟通的最大障碍。”^[5] 避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猜忌和误读的有效方式是增加文化交流, 规避文化传播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语义偏移, 进而消弭因误解而产生的对抗和冲突。文化比政治经济更有影响力, 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不能替代文化交流, 文化产品和商品消费蕴含着文化和价值观。钱钟书通读西方经典, 致力于“打通”文明间异质性认同, 坚信中西文化“和而不同”, 诗心文心互文会通, 即“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6]。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元素和载体。语言与文化、历史、思想结合紧密。赫尔德说: “语言是一座人类思想的宝库, 藏有每一个人以自身方式做出的贡献; 它也是一切人类心灵持续活动的总和。”乔治·斯坦纳认为, “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 只有依靠语言, 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 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 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 大声而绝望的沉默, 带着词语的记忆”^[7]。

三、中西文明差异与文化碰撞

(一) 中西文明内涵的差异性

中华民族文明史已有 5000 多年。《尚书》已有文明的概念: “睿哲文明, 温恭允塞。”“睿哲文明”, 是用来颂扬圣王舜的聪明、贤达。《易经》的“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 含有开化、文秀、光明之意。《易经》中有“文明以健, 中正而应”“其德刚健而文明, 应乎天而时行”的论述, 其意为: 素质刚健而又文明, 行为公正不偏且相互呼应, 是君子应该坚持的正道。文明赋予人类以政治、精神方面进步的含义。

西方“文明”一词首先出现在 1766 年的一本法文印刷物中, 指的是一种关于思想、技术、道德、社会进步的世俗理想。文明就是“启蒙”, 与之相对的是“野蛮”。与中文不同的是, 英文 civilization (文明) 的词根源于拉丁文的 civilis, 其内涵非常丰富, 含有公民、市民、城邦、社会等意思。拉丁文中的 civilis societas, 在近代英文中为 civil society, 可译为“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文明社会”, 不但指单一国家, 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型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场景。这些共同体拥有自己的民法典, 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 (野蛮人和前城市化不属于市民社会) 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西方“文明”一词, 其着眼点在于基层组织 and 底层人士, 指形成为国家的一定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法律、精神、艺术、心理等文明性状, 并和政治相联系。从本来的意义上说, “civi”既是“公民的”, 也是“文明的”, 而且是“政治的” (political)。正是由于“civi”和“political”二者之间相通, “civil society” (文明社会) 也称为“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古希腊雅典时期的伯里克利, 就把公民和政治、民主政治紧紧连在一起。他说: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 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近代法国的启蒙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联系, 指出, “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 就是民主政治”^[8]。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9 北京共识》倡议, 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 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昭示中, 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 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 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 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陈独秀认

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9]。杜亚泉(伧父)则认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10]。可见,“静”的中国传统哲学提倡和平与仁慈,“动”的西方近代哲学推崇武力与争斗。中国近代大陆农耕文明仍然死守农业文明的宗族观念,而西方海洋文明已形成工业文明的民族国家观。

(二) 中西文明与文化的三次碰撞与教训

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会因文化的异质性产生碰撞,这种碰撞会有三种可能性结果。其一,征服:教化或毁灭;其二,文化掠夺;其三,交流。这是一种相互尊重和影响的双向过程。欧洲与中国的最初接触,正是这种情形。14世纪初,《马可·波罗游记》的发表开启了欧洲对东方的向往。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进入中国传教,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1615年,拉丁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据统计,17、18世纪耶稣会士将7000多种西学书籍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了与中国历史和哲学有关的作品723种,其中法国最多。“东学西渐”过程中,中国思想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中西文明遭遇第一次碰撞。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海洋商业文明超越了大陆农业文明,康乾盛世的繁荣并未使中国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而是逐渐落后于西方。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1/4,1840年下降到不足1/5。“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1/3,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1/5,略超过美国的1/4;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1/5。”^[11]世界格局的转变改写了中西文明的命运,“东学西渐”式微,“西学东渐”强劲。1793年英国派遣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中国君主,中西两种世界秩序迎头相撞。清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藩属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使者因认为这是对英王的羞辱而坚决拒绝,目的是追求英中平等。“礼仪之争”始自天津,经北京继而到热河,最终达成对大清皇帝“单膝下跪,双手奉上礼物”的共识。此时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已经过去300余年,此间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疯狂建立殖民地,当时占领殖民地最多的国家非英国莫属。英国政治上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现代化肇始于英国,英国经济上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飞跃,工业实力迅速攀升,接连战胜了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老牌强国,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人迫切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把目光从印度投向了中国。西方国家衡量文明的标准是科学和技术,而在中国皇帝眼中,王朝威严体现于礼仪、道德、伦理。欧洲人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教会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用理性指导现实生活。18世纪科学和技术发明日新月异,欧洲各国在军事、科技、殖民地等方面展开持续竞争。马戛尔尼使团一行有4艘船,使团700余名成员中有大量的学者、技师、医师,还有一艘装备64门火炮的军舰,准备在中国皇帝和大臣面前展示新式武器的威力。为乾隆皇帝准备的礼品也充分体现了英国的工业化程度,有火炮步枪、精密的天体运行仪、蒸汽机、织布机等。马戛尔尼自信英国使团带来的新鲜器物一定会让中国感到震惊和新奇,从而促成与中国的建交通商。但事与愿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乾隆皇帝和大臣恪守华夏中心论,只关心伦理纲常,把英国使团带来的近代科技和军工产品视为“奇技淫巧”。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特使到北京探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被嘉庆皇帝撵走了。迂腐颟顸的清政府错失与西方平等交往和开启现代化的历史机遇,24年后英国决意以武力撬开“天朝”大门。

1840年鸦片战争:武力冲突。中英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并催生了中国民族主义。1750年前后,英国进入全球殖民扩张的新阶段。1773年,英国确定了对华鸦片贸易方针,授予

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权，用对华输出鸦片扭转英中近 3 个世纪的贸易逆差。英国本土-英属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羊毛和矿产品-鸦片-中国丝绸和茶叶）成为英国经济和英属印度财政的重要来源。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中英茶叶与鸦片贸易失衡。它标志着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对东方扩张进入最后的完胜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进入瓦解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东南沿海；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进首都北京，鸦片贸易和基督教传教合法化。西方扩张势力在中国内部分解了中国社会，形成洋人、朝廷、百姓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中国从此步入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观念在西方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国开放主义与排外主义之间不断摇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从民族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经历了痛苦的探索。西方势力深入中国腹地，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学习其技术、制度与观念，为了救亡图强，不得不接受西方扩张的文明。严复在甲午战争后呼唤“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清政府接受西方文明竟然是以 7 次内外战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的触动和败局为代价的。中国摆脱落后挨打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又总是与西化纠缠在一起，如果现代化的结果是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将失去中国本土的文化身份，失去“本土中国”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入新的快车道。“强国富民”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心中的梦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强国，一直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1956 年毛泽东说：“1911 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 45 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 45 年，就是 2001 年，也就是说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貌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2]这一预言已经被证实。他又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运动时值艰难的美苏冷战时期，中苏从结盟到反目，反帝反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西方对华封锁中构建了国家现代重工业体系。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2 年人均 GDP（537 美元）低于 1820 年欧洲工业化国家（4374 美元），也低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和同期印度的人均水平^[13]。1978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340 美元（当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为 660 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6%。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从 1952 到 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了 174 倍，人均 GDP 实际增长了 70 倍。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2 年中国 GDP 仅 679 亿元，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 70 万亿、80 万亿、90 万亿元大关。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上升到 2018 年的近 16%。1961—197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 1.1%；1979—2012 年，年均贡献率升至 15.9%，仅次于美国；2013—2018 年，年均贡献率升至 28.1%，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社会变革，40 余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跃升。1978—2017 年，GDP 从 1495 亿美元增加到 12.3 万亿美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 33.5 倍，年均增长 9.5%；中国人均 GDP 从 156 美元增加到 8827 美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 22.8 倍，年均增长 8.5%，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从半封闭状态转变成成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主要的引进外资大国及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外汇储备 1978 年仅有 1.67 亿美元，2017 年底达到 3.14 万亿美元。中国不但为世界贡献了增长，也增益了世界的公平和包容。“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迓，以定我王。”（《诗经·大

雅·民劳》) 70余年来,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逐渐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14],成为世界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上述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声望的提升,中西方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对英语霸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国家强盛是争得国际话语权的物质基础,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关键因素。

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追赶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逐渐从互惠变为碰撞和冲突。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全球产业链重组,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政策,对中国发起旨在“脱钩”的贸易战就是实证。美欧推进的西式全球化不断遭遇挫折,西方价值理念的耀眼光环褪色。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特朗普政府全面封堵和遏制中国复兴和崛起。在文化领域,美国甚至关停“孔子学院”。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规定,禁止通过孔子学院进行语言培训。全美孔子学院共有100多家,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5,受到影响的接近20家。对此,我们应抱以警觉并重新定义孔子学院的功能,防止西方国家把孔子学院意识形态化;应淡化孔子儒家学派的身份,强化其“至圣先师”的教师身份和人类轴心期思想家的地位。孔子学院目前仅是一个汉语教育机构,其基本定位是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应将其功能提升到“推进国际汉语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新高度。另外,为发展中国家孔子学院增设“汉语+防疫与中医针灸”“汉语+旅游与酒店管理”“汉语+建筑”“汉语+电子商务”“汉语+全球及区域政治经济治理”等实用专业和课程,争取依托所在国著名学府申请进入国民教育序列。

当下全球文明与文化交流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如:配合国家战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中外高校间人文交流与前沿领域科技合作、小语种文学名著互译、影视合作、企业间联合攻关,等等。这对于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协同发展,培育知华、友华友好人士和阶层,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全球化文明的未来选择——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克服全球性问题的钥匙。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军控、瘟疫及毒品扩散等问题日益严峻,给世界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同舟共济、协调行动,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倡议:“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思想是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所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当代世界的多元性凸显和一体化趋势之间的对立冲突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杜维明通过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时代内涵。我们要借助“轴心时代”理论,通过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辟,论证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注重在现代世界文化冲突背景下建构儒家道德理性的现代性。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否定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前者认为,后冷战时代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争斗的是被美苏两极格局解体所释放的文明冲突。其逻辑是:各

民族和各文明不仅追求获得显赫的地位，而且要阻止其他民族和文明获得这种地位。但亨廷顿过分强调了文明冲突却忽视了文明的交融互鉴，而文明对话与融合需要跨文化交流。全球性问题的多元性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多元互动趋势，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不可逆转。《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聚焦“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讨论“西方”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报告深刻指出，当今世界许多最重要的挑战，仅靠西方的力量已无法解决，需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合作应对。报告显示西方担心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主导地位，担心欧美统一立场因正在生成的不同理念和利益取向而受到侵蚀，担心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被所谓“威权国家”势力“修正”。

促进文明多样性是保障各民族国家人文价值观的前提条件，以文明多样性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主流。国际社会期待多元文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能够平等对话、和平共处，摒弃文化霸权、冷战零和思维以及任何落后于时代的政治偏见与谎言，共同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和发展挑战。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5]。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疫情不分国界，抗击疫情要摒弃对抗思维。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国际协同是一场缔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16]。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毫无保留地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向暴发疫情的国家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提供药品和防疫物资，与国际社会协同防疫、科技合作，以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诠释和彰显中国的国际道义与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EB/OL]. (2014-09-24) [2019-07-0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 [2] 习近平.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J]. 求是, 2020 (3): 4-7.
- [3] 陈炎. 文明与文化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2.
- [4] 高放. “全球化”一词的由来 [J]. 拉丁美洲研究, 1999 (6): 57.
- [5] 阿雷恩·鲍尔德温, 布莱恩·朗赫斯特, 斯科特·麦克拉克肯, 等. 文化研究导论 [M]. 陶东风, 和磊, 王瑾, 等译. 修订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3.
- [6] 钱钟书. 谈艺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序 1.
- [7] 乔治·斯坦纳. 语言与沉默: 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M]. 李小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序 5.
- [8]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 [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9.
- [9]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M] // 陈崧.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2.
- [10] 伦父.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M] // 陈崧.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0.

- [11] 刘逖. 1600—184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 [J]. 经济研究, 2009 (10): 144-155.
- [12] 毛泽东. 纪念孙中山先生 [N]. 人民日报, 1956-11-12 (1).
- [13] 胡鞍钢. 中国大战略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59.
- [14] 侯雪静, 姚兵. 70 年, 中国 7 亿多人摆脱贫困 [EB/OL]. (2019-09-16) [2019-10-2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16/c_1125002433.htm.
- [15]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OL]. (2017-10-28) [2019-10-28].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 [16] 习近平. 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 [EB/OL]. (2020-03-26) [2020-03-30].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327/c64094-31650097.html>.

The Paradigm Change and Future Choice of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Hao Guiju

Abstract: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are the unique spiritual and value symbols for nation-states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llision, conflicts and ble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 and pluralism and combs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wo centuries and the winding of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alyzes the mutual learning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future choice of human society is to creat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hina has demonstrated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with concrete actions and implemented the initiativ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health.

Keywords: civilization; cul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communication paradigm;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收稿日期: 2020-03-31; 责任编辑: 陈鸿)